

网络餐饮代办入驻现象调查: 支付千元即可入驻外卖平台

■ 赵丽

11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一“办法”早在征求意见期间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餐饮外卖市场越来越大,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新业态模式不断对监管提出挑战。因此,很多人都对这一“办法”寄予厚望。不过,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小动作”,已经在挑战这一“办法”。

晚上七点,对于仍在加班的胡凌来说,又到了外卖时间。这大半年来,胡凌点的外卖基本都被“回家吃饭”这款家庭共享厨房App“承包”了。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胡凌经常加班加点,叫外卖是常事。不过,最近的一条新闻让胡凌有些担心,他刚刚养成的就餐习惯可能受到影响。

“听说关于网络餐饮的新规定明年就要实施了,要求网络外卖应当具有实体店铺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胡凌说,“据我了解,家庭共享厨房大多是一些赋闲在家的人兼职在做,不可能满足这两项条件。新规定的此项要求,多少会对家庭共享厨房这种外卖模式造成冲击。”

胡凌说的新规定,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11月10日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超范围经营。

胡凌坦言,这样的规定肯定会净化网络外卖行业,对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保障而言是个利好。“此前媒体经常报道一些网络外卖黑作坊的新闻,去年‘3·15’期间网络外卖的安全问题就被重点曝光,这个规定在食品安全领域是好事”。

然而,《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出

现的网络餐饮“代办入驻”服务可能消减新规的积极意义。

多数消费者在意“实体店铺”

每到饭点,胡凌就职的公司所在的写字楼里,各家平台的外卖员拎着各类食盒行色匆匆地在不同楼层间穿梭。写字楼的电梯在此时也变成下楼吃饭员工与外卖员之间的“战场”。

不久前,胡凌曾与同事在某披萨店吃饭。当时正是饭点,但在各种写字楼包围下的餐厅除了她们几人外,居然没有其他顾客。就在胡凌点单后的15分钟内,有四五名外卖员前来取餐,到披萨店就餐的胡凌几人被排在了这些外卖订单之后。

“下次还是点外卖吧。”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让胡凌更坚定了点外卖的决心。

不同于胡凌迫于无奈的选择,30岁的钱浩是真正的外卖爱好者。

安全卫生、能吃、能送到是钱浩对外卖的全部标准。上班叫外卖自不必说,在家也几乎从不做饭,钱浩对外卖的依赖越来越强,“说实话,我见外卖员的次数可能比我见朋友的频率都高”。

不过,在餐饮外卖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餐饮外卖平台能否确保食品安全?这一问题让消费者忧心忡忡。2016年,央视“3·15”晚会曾曝光外卖平台存在的“黑作坊”以及大量管理漏洞。

对这些问题,钱浩说:“我对食物的态度虽然比较随意,但是对安全卫生却很在意。毕竟这是要吃进肚子里的,所以我经常点的外卖店家都是我确认过有实体店的。”

说起实体店,消费者也是有话要说

在北京某高校读研一的陈晴曾听同学提起过,“有些外卖商家只是在自己家里临时形成一个‘小作坊’,每天批量生产外卖食品”。

陈晴觉得这种“实体”形式没有安全保障,“但点餐时也并不会刻意避开”。

与钱浩一样,25岁的龚祺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点外卖对他来说也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龚祺在点外卖时,更愿意选择那些“亲自去实体店里吃过”的商家。“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样会对饭菜的口味比较了解,二是感觉有实体店铺相对更加卫生、安全”。

在《法制日报》记者实地调查过程中,65%的受访者认为有实体店铺意味着更卫生、安全更有保障。

不过,也有消费者对“实体店铺”持不同看法。

来自浙江慈溪的马源觉得,无“实体店铺”的商家也有自己的优点。“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没有实体店铺的外卖商家,定价往往更低,送餐也更快。从店家的角度来说,运营成本也比实体店铺低很多”。

35岁的刘泓义是北京某连锁餐饮品牌的分店店主,看到这则关于网络餐饮的新规定,他很开心。

“如果允许大量‘家庭小作坊’提供外卖,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不正当竞争。”刘泓义说,由于运营成本,实体店铺很难在与“小作坊”的竞争中胜出。“‘小作坊’之间也会相互竞争,为了不断压低价格,自然就会牺牲食品的质量”。

刘泓义告诉记者,外卖行业的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是“现实竞争的网络化”,“但归根结底,大家比的还是食品的品质”。

“代办入驻服务”已经出现

《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办法”关于实体店铺的规定,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对策”。

记者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信息中介平台上,不少商家推出“入驻外卖代开代办”服务,甚至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或一些问答



平台上,也有一些人声称可以帮助无实体店的外卖经营者办理入驻外卖平台事宜。

记者与一些提供代办服务的商家交流了解到,大部分代办服务提供者称,他们可以利用信息差以及相关漏洞,帮助一些商家尤其是无证经营的商家入驻外卖平台。

记者发现,这些代办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范围很广,在全国各地都有业务。“全国代办美团外卖饿了么糯米团购……”一名微信昵称为“外卖代办”的代办人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此外,在一家搜索平台投放广告的代办服务提供者还作出保证——实力代办,不成功退款。“你可以做出绝对美味的味道,做的口感非常优秀,但是如何开通一个外卖店铺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外卖开店的流程和要求很严格,更不要说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店铺就想做外卖。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也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让所有诚心想开外卖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店铺。”上述代办服务提供者称,“首先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可能之前听说过的幽灵店铺,还有封店的问题,我们的分析是‘超值低价一定是骗人的,被封店的概率一定是百分之百,另外一部分就是改一下店铺资料借用给你几天后再收回,有的是单纯的骗定金,这些都是我们在开店的时候要避免的,几百块钱开店一定不是正规渠道,也提醒您注意这个问题”。

一名自称是业内人士的代办服务提供者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如果诚心想做外卖、卫生条件足够卫生,可以有特殊渠道进行外卖

开店,“不需要营业执照、不需要门店,只要是真正的想挣钱想开店不是来破坏平台秩序的都可以开店。按照指定的地址、指定的门店名称,只需要配合提供一些基本资料,一般一到五天就可以成功上线”。

具体如何操作呢?记者又联系到微信昵称为“外卖代办”的代办服务者。“通过代办入驻外卖平台,只需1000元到1500元,商家可以避免繁琐的手续和严格的入驻标准,轻松开展日趋火爆的外卖业务”——这是这代办服务者打出的广告。

没有营业执照怎么办?“外卖代办”回复:无证商家若想在外卖平台上开店,只需向代办人提供店铺名称、店铺照片、个人身份证及手持身份证照片、银行账户等信息、手机号码即可。

没有实际店铺、只是在家庭经营该怎么办?“外卖代办”回复:只要是在小区一楼就没有关系,“如果不是在一楼会被平台下线”。

如此操作不会被监管部门发现吗?会不会被查处?“外卖代办”肯定地说,“不会有来自查的”。

记者发现,这些代办服务提供者虽然在网络上大肆宣传自己的业务,但收费都是通过微店或淘宝店铺等进行。

在一名代办服务提供者的微信朋友圈,记者发现,一些商家在入驻平台后未支付价款,其商家信息和个人信息被直接公布在代办服务提供者的朋友圈里,同时,还会配上一句话——“这个人无证经营,大家快去举报他”。

倒垃圾竟成了“考试”? ——垃圾分类“原地踏步”如何解

垃圾分类遇到哪些“坎”?

垃圾分类“原地踏步”背后有哪些难以迈过的“坎”?记者采访发现,许多地方仍然缺乏统一明确的分类标准,比如,垃圾处理是必须配备智能化垃圾处理设备,还是简单放置两个分类垃圾桶。

谈及垃圾分类推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一位业内专家深有感触地说,有的垃圾分类设备看上去很“智能”,实际上很复杂,普通居民扔个垃圾不仅要扫码,还要输入验证码,程序繁琐,像“考试”一样,无形中提高了居民使用的门槛。

“垃圾分类收集系统必须便民。”中国农业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朱芬芬表示,过于强调分类收集,而不顾大部分人的工作生活压力,会适得其反。

专家介绍,即使在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的社区,大部分垃圾分类工作做得也并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基本上没有人真正按照分类去投放垃圾;另一方面在于垃圾收集车辆没有按分类垃圾进行收集。

陶镇广表示,经过近些年的努力,虽然广州基本建立了资源循环处置利用机制和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但也面临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

垃圾分类部门协同力度不大、分类收运体系不完善、混收混运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等难题。

混合收集导致垃圾处理成本居高不下。在北京朝阳清洁焚烧中心,总工程师陈辉告诉记者,该焚烧中心建于2014年,设计日处理垃圾量为1800吨,然而去年投入使用时,所负责地区的垃圾产生量已经大大超过了设计处理量,为避免污染大气,不得不付出大量成本用于处理焚烧产生的有毒气体。

垃圾处理企业运营困难,也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推进效果。在华东地区某地,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着一个地级市15个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项目,其中日均厨余垃圾3吨,可回收物150公斤。这家公司负责人反映,公司已投入了上千万元,“可政府补贴只有60多万元,再这样下去公司就撑不住了。”

既要源头减量,也要完善收运

近年来,我国商品包装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一次性物品也增加了垃圾的产生量,其中外卖与快递产生的垃圾量迅速攀升。在垃圾处理体系不够完善的背景下,源头减量将成为冲破“垃圾围城”的第

一步。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指出,亟需快递公司举平台之力推广利用绿色包装,并拿出技术与监管方案,减少白色垃圾的产生。

同时,各地政府应继续完善分类收运体系。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高海洋说:“公众要提高意识,政府方面在垃圾处理上要有机制。”多位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其他垃圾收运线,配备能满足垃圾分类清运需求、密封性好的专用收运车辆和收集容器,做到不同的车拉不同的垃圾,并进一步升级改造垃圾房、转运站、压缩站。

“垃圾分类工作的公共服务属性很强,完全依靠市场调控与个人道德,不太现实,更需要政府政策倾斜。”安徽一家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负责人说,“当地垃圾分类还差哪个环节,政府可探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企业去‘补差’。”

针对目前公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合肥市城管局宣传处处长李大勇建议,各地应探索建立垃圾分类奖惩机制,并与个人信用体系挂钩。“分类与不分类,只有与切身利益相挂钩,才会更有效果。”

百天吸金千万 ——“网红”“黄播”牟利黑色链条调查

■ 史竞男

网络女主播“东北水仙二嫂”日前落网。

因在“狼友直播”平台上进行淫秽表演,该女主播曾“红极一时”。短短3个月,“狼友直播”平台吸纳全国各地注册会员17.7万人,涉黄女主播1000余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浏览涉黄直播平台的人次达百余万,遍及全国。

这起特大传播淫秽色情网络直播平台牟利案告破,也揭开了涉黄直播牟利的真相——“黄播”背后,暗藏的是一条精心设计的规模化、产业化黑色链条。

“黄播”网络覆盖全国 靠淫秽表演吸引用户

直播产业出现,很多普通人成为“网红”尝到了当明星的滋味,并通过在网上聚集的人气迅速发家致富。然而,这种门槛低、受众广的直播平台泥沙俱下、乱象频出。

今年6月,群众举报“狼友直播”“辣眼睛”,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立即跟进,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执法人员对取证视频内容进行审查分析发现,该平台拥有较多网络主播,实时现场直播淫秽色情表演,吸引大量用户付费观看和打赏。其直播APP覆盖主流安卓和苹果手机

操作系统,用户可跨终端随时随地观看和分享。

经查,该平台直播间平均观看人数在3000人以上,注册用户数量巨大,且24小时都有主播在线。平台制作、传播淫秽表演视频文件信息超过20万个。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其实传播淫秽物品的数量数额属“情节特别严重”。

随着案件深入调查,沉于网络之海下的冰山渐渐显露。办案人员前往广东、四川、山东、湖南、黑龙江、浙江等地,对电信、移动、联通、银行及相关物业管理公司等依法采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关数据信息,一个跨多省特大传播淫秽色情网络直播平台浮出水面——

其服务器在浙江宁波,维护在浙江杭州,提供存储和直播的是上海某技术公司,运营是湖南岳阳某科技公司,提供涉黄女主播的“家族长”在四川南充,该涉黄直播平台网络覆盖全国,各地都有注册会员和浏览涉黄直播平台人员。

利益驱动有禁不止

频换“马甲”逃避打击

网络直播这种新传播形式,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问题。违法违规内容泛滥的背后是利益。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案件督办处副处长李泽泓介绍说,网络直播平台主要盈利模式是基于虚拟礼物的打赏,粉丝花钱买虚拟礼物送给主播,主播据此与直播平台分成。“因为有相关利益的存在,所以主播会有驱动力去做一些违法犯规的事情。而网站因为流量或相关利益的需要,会放任这种行为。”

逐利冲动下,一些平台经营者和网络主播无视规则和底线,屡屡涉黄。更有一些涉黄主播与犯罪组织、黑产团伙相互勾连,结成利益攫取与分配的共同体,以求短时间赚个盆满钵满,梦想一起“做大做强”。

办案人员透露,虽然国家对“黄播”严令禁止,但不法分子东躲西藏,继续铤而走险,

他们采取不断更换平台的方式来逃避监管和打击,只求短期获利,迅速变现。“狼友直播”平台就是在短短30天里,进行了3次版本升级,10余次变换域名和软件下载地址,名称从最初的“狼友”变更至“梦幻”,后改为“逆境”。此外,从事淫秽直播表演人员都是以虚假信息注册,大部分银行账户也是冒用他人户名登记的。

据透露,“黄播”观众中很多是未成年人。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涉黄直播是互联网空间的一颗毒瘤,大量含有宣扬淫秽色情内容的视听节目在网络上传播,严重损害社会公德,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极易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

网络扫黄多管齐下 主播“黑名单”制度确立

黄毒泛滥,为网络直播蒙上了阴霾。今年以来,已有“夜魅社区”“微笑直播”“LOLO”“馒头”“老虎”“蜜直播”等几十个涉黄直播平台被查处。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薛松岩介绍说,网络已成为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这些案件中虽然多数涉案直播平台运营时间不长,但涉案金额多、社会危害大。

“网络直播的属性决定了监管的难度。”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认为,直播平台服务的多样性、匿名性、瞬时性、多变性、隐蔽性等特性,是直播平台涉黄的重要支撑。网络直播涉黄治理,需要坚持专项整治、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协同治理等“多管齐下”。

佟丽华表示,在网络监管方面,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据了解,全国“扫黄打非”办已会同国家网信办共同牵头,协调中央多部门及部分省区市建立了网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长效机制,形成了较强的工作合力。同时,各地加强行业监管,严格落实24小时监测要求,发现违规直播立即封停,并建立主播“黑名单”制度及行业通报机制,对违规主播实行全行业禁入。

“对直播涉黄等违法行为,‘扫黄打非’部门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态势,一旦发现将追查到底,对查实的平台和人员必将依法严惩,绝不手软。”薛松岩说。